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
研究丛书之六

晚期巴蜀青铜器技术研究及 兵器斑纹工艺探讨

姚智辉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丛书之六

晚期巴蜀青铜器技术研究 及兵器斑纹工艺探讨

姚智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采用金相显微镜、SEM-EDS、XRD 等手段,对成都平原及其峡江流域 10 余处遗址出土的 157 件器物进行截面或表面成分及金相、矿相的成分研究;并通过宏观观察与微观分析及采用模拟试验方法,对巴蜀兵器上独具特色的虎斑纹进行工艺上的探讨。进一步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文化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其成熟与鼎盛时期,巴蜀文化虽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一定影响,但不同于周边文化的自身发展仍是其主流,而表面斑纹则可能是热镀锡及镀锡后退火处理形成的。

本书适合于巴蜀文化、传统工艺等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期巴蜀青铜器技术研究及兵器斑纹工艺探讨/姚智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丛书;六)

ISBN 7-03-017298-1

I. 晚… II. 姚… III. ①青铜器(考古) — 研究 — 四川省 — 春秋战国时代②兵器(考古) — 器物纹饰(考古) — 研究 — 四川省 — 春秋战国时代 IV. ①K876.414②K87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2920 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吴伶俐 王国华 / 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安春生 / 封面设计:黄华斌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6年6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 3/4 插页:2

印数:1—1 200 字数:236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本书的出版得到
郑州大学“十五”“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资助

“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韩国河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星光 许俊平 李国霞

陈 飞 陈朝云 张国硕

韩国河

总 序

2003年初，郑州大学“十五”“211”二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开始实施，“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作为子项目获准立项。原定的建设目标及任务是：依托地理优势，发扬优良传统，不断开拓进取，通过“十五”“211工程”的重点建设，在3年内拿到一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把郑州大学考古、历史专业建设成为一个与国内外同类大学整体水平相当、中原文化与古代文明研究方向水平领先、河南乃至全国培养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并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商文明、东周两汉文明、陶瓷研究（科技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等方向的研究上有所突破或进展。根据这个大的方向与目标，我们又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和量化的具体任务。其中，资助该学科研究团队的成果出版也是一项重要衡量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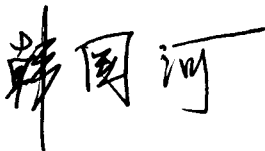
经过近三年的建设，我们陆续资助了《尚书译注》、《三礼译注》、《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西周封国考疑》、《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秦甲冑研究》、《郑玄以礼笺〈诗〉研究》、《长安汉墓》、《中华古史求索集》、《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魏晋南北朝史发微》等专著的创作与出版。最近，又与科学出版社签约出版“中国古代文明与考古学”研究系列图书，主要有《新乡李大召——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商代聚落体系及其社会功能研究》、《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等等。除此之外，还将出版《郑州大学科技考古文集》以及物理考古、冶金考古方面的专题研究著作。

从以上已经出版或陆续出版的著作内容来看，主要由考古发掘报告、专题研究、文献考据、个人文集四个方面组成，集中反映了郑州大学历史学科近期在“中国古代文明”方面的研究领域与水平，体现出了学科的优势与特色：一是中原地区考古新发现；二是古代文化遗产的综合整理与深化研究；三是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些成果不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资料，也为郑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2003年，郑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初，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2次会议

批准，郑州大学历史学科又获得了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些高水准的研究成果才支撑起了学位点建设的脊梁。

总之，通过著作出版这样一个侧面，我们认为郑州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的最大成效之一是对学科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表现于建立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年龄、职称、学历结构相对合理的师资队伍；二是体现了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三是构建了一个大的学科研究平台，初步探索了文理工等多学科相交叉、相融合的合作研究模式；四是占领了一批学术前沿课题，为今后师资队伍及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对多年来支持郑州大学历史、考古等人文学科发展的各级领导、专家、同仁以及单位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e characters '韩国河' (Han Guohe) in a cursive style.

2006年1月12日

前 言

成都平原与峡江流域出土大量从春秋末战国初到西汉初期这一时段的青铜器。春秋末战国初到西汉初期的巴、蜀文化在棺槨情况、随葬器物组合及随葬兵器形制纹饰等方面已经不能完全分开，巴、蜀文化融合为一体，成为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同一种文化——巴蜀文化。几乎所有出土铜器的墓葬都随葬有兵器剑、戈、矛、钺、镞、盔等，常见有短叶和长叶矛、柳叶剑，以及多种样式的戈、不同形式的釜口钺。兵器上纹饰以虎、蝉、虫等动物纹为多，并有奇特的“巴蜀符号”。另外，兵器表面常呈现不同颜色和形态的“虎斑纹”。近年来在峡江流域发掘了不少遗址、墓葬，出土了大批战国—西汉初期的巴蜀青铜器，本书称之为晚期巴蜀青铜器。它们为巴蜀青铜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对深入认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四川盆地的巴蜀青铜器，是古代巴蜀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显著的地方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闻名于世。其中兵器又是巴蜀青铜器中数量最多、最具特色的一类，它集中体现了巴蜀青铜器的制作水平。

从考古学、历史学等角度对巴蜀青铜器已有较多研究，但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少，多集中在成都平原，峡江流域晚期巴蜀青铜器多是近年来伴随三峡工程发掘的，故研究更少。本书尝试较系统地研究峡江地区青铜器的成分、组织结构、工艺，与战国时期周边青铜文化及巴与蜀青铜技术进行比较讨论，阐明其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及其在青铜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为研究峡江流域金属史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

巴蜀兵器表面“虎斑纹”在巴蜀兵器中极具特色，其工艺制作技术及形成机理尚待研究。本书首次对考古样品“虎斑纹”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其工艺，进行模拟实验，并从热镀锡过程中基体的铜向液态锡中溶解扩散的角度，对古代“虎斑纹”的形成进行探讨。

在对晚期巴蜀青铜器技术及兵器表面斑纹工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巴蜀与周边地区青铜器的形制、成分、表面工艺等，对巴蜀与周边之间青铜文化的发展与交流进行了初步探讨。

课题调研期间，得到了重庆市三峡办刘豫川先生的大力支持。重庆市考

古研究所邹后曦先生、方刚先生，四川大学考古系黄伟先生、白彬先生，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建华先生，南京博物院邹厚本先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毅先生、江章华先生、肖璘女士、白玉龙先生，成都博物院段炳刚先生等为作者调研工作提供了大力帮助。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曾中懋先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何堂坤先生及鄂州博物馆董亚巍先生无私地提供了样品。董亚巍先生为论文模拟实验提供了场所。在此对提供帮助的文博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课题研究期间得到导师孙淑云先生的悉心指导，从选题到具体的分析研究，孙先生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也有幸得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诸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在此真诚地向他们表示感谢。

鉴于作者学术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6年1月

目 录

总序	韩国河 (i)
前言	(iii)
第一章 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	(1)
1.1 巴蜀的历史	(1)
1.2 巴蜀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	(4)
1.3 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	(5)
1.3.1 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分期、范围、特点	(6)
1.3.2 巴蜀地区的青铜器	(8)
1.3.3 巴蜀青铜兵器	(13)
第二章 巴蜀青铜器技术研究现状	(19)
2.1 巴蜀青铜器的成分分析	(19)
2.2 巴蜀青铜兵器的表面斑纹工艺研究	(20)
第三章 研究内容与方法	(22)
3.1 研究内容	(22)
3.2 研究方法	(22)
第四章 出土青铜器的分析研究	(24)
4.1 峡江地区出土青铜器分析研究	(24)
4.1.1 峡江地区青铜器样品采集与统计	(24)
4.1.2 峡江地区出土青铜器的分析	(28)
4.1.3 峡江地区其他金属器物的分析	(39)
4.2 成都平原出土青铜器分析结果与比较	(44)
4.3 总结	(48)
第五章 巴蜀青铜兵器表面斑纹的研究	(49)
5.1 带斑纹兵器的调研	(49)
5.2 带斑纹兵器的无损分析	(54)
5.3 几件斑纹兵器残段样品的分析	(59)
5.3.1 表面分析	(59)
5.3.2 截面 SEM-EDS 分析	(63)
5.3.3 小结	(66)

5.4	巴蜀兵器表面斑纹的实验研究	(69)
5.4.1	对表面斑纹工艺的初步认识	(69)
5.4.2	模拟试验	(71)
5.4.3	热镀锡及退火方法	(80)
5.4.4	巴蜀兵器斑纹工艺推测	(80)
5.4.5	小结	(82)
第六章	青铜技术与文化的相关探讨	(83)
6.1	铜器制作水平探讨	(83)
6.2	峡江流域和成都平原出土青铜器的比较	(87)
6.3	峡江流域与周边青铜技术的比较	(88)
6.4	巴蜀铜器矿料来源初探	(93)
6.5	青铜文化的比较	(96)
6.5.1	峡江流域与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的比较	(96)
6.5.2	峡江流域与周边青铜文化的比较	(97)
6.5.3	巴蜀青铜文化小结	(106)
6.6	总结	(107)
第七章	结论	(109)
参考文献	(110)
附录 A	峡江流域出土器物金相观察	(118)
附录 B	带斑纹样品 X 射线衍射图谱	(143)
附录 C	前人的部分研究工作	(153)
	彩版	

第一章 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

1.1 巴蜀的历史

四川盆地是我国重要的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相传早在夏商周就并存过巴、蜀两国。如《华阳国志·巴志》：

“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华阳国志·蜀志》：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圃。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

《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一些传说虽富有神话色彩，但如王国维、尹达等学者所说，有其史实因素。巴蜀的历史与中原一样亘古久远，巴蜀很早就与中原有着联系，在三代有重要地位，这与考古发掘所得是相吻合的^[1]。

巴族、蜀族是我国古代生活在西南地区的两个部族。夏商时期，蜀族以今成都一带为中心、巴族以今重庆为中心建国。公元前316年，秦国出兵打败巴、蜀，设置了巴郡与蜀郡，巴、蜀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巴蜀的分界是合川，射洪为巴蜀接地。以涪江为界，东为巴，西为蜀，见古代巴蜀示意图（图1.1）。

关于巴人的起源，观点很多，已知就有四五种说法，如陕西关中^[2]、甘肃天水^[3]、淮水流域^[4]等。有确切纪年史料的是出土的武丁时期甲骨文中提到的巴方^[5]，商武丁时与巴方发生过多场战争，最后一次，武丁亲自统率将军妇好、沚震出征，征发村社众人参战，才取得胜利。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华阳国志·巴志》载：

“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

以上记载说明商周时期巴的武力强大，与中原已有密切联系。杨铭在《西南民族史研究》一书中提到：巴人部族的形成在商代，巴人主要分布在川东、鄂西一带。春秋以前居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西北），首领为灵君。巴人离开武落钟离山，分有三支^[6]：一支由长江而上，散居今日三峡和重庆一带；一支散居今湖北和湖南一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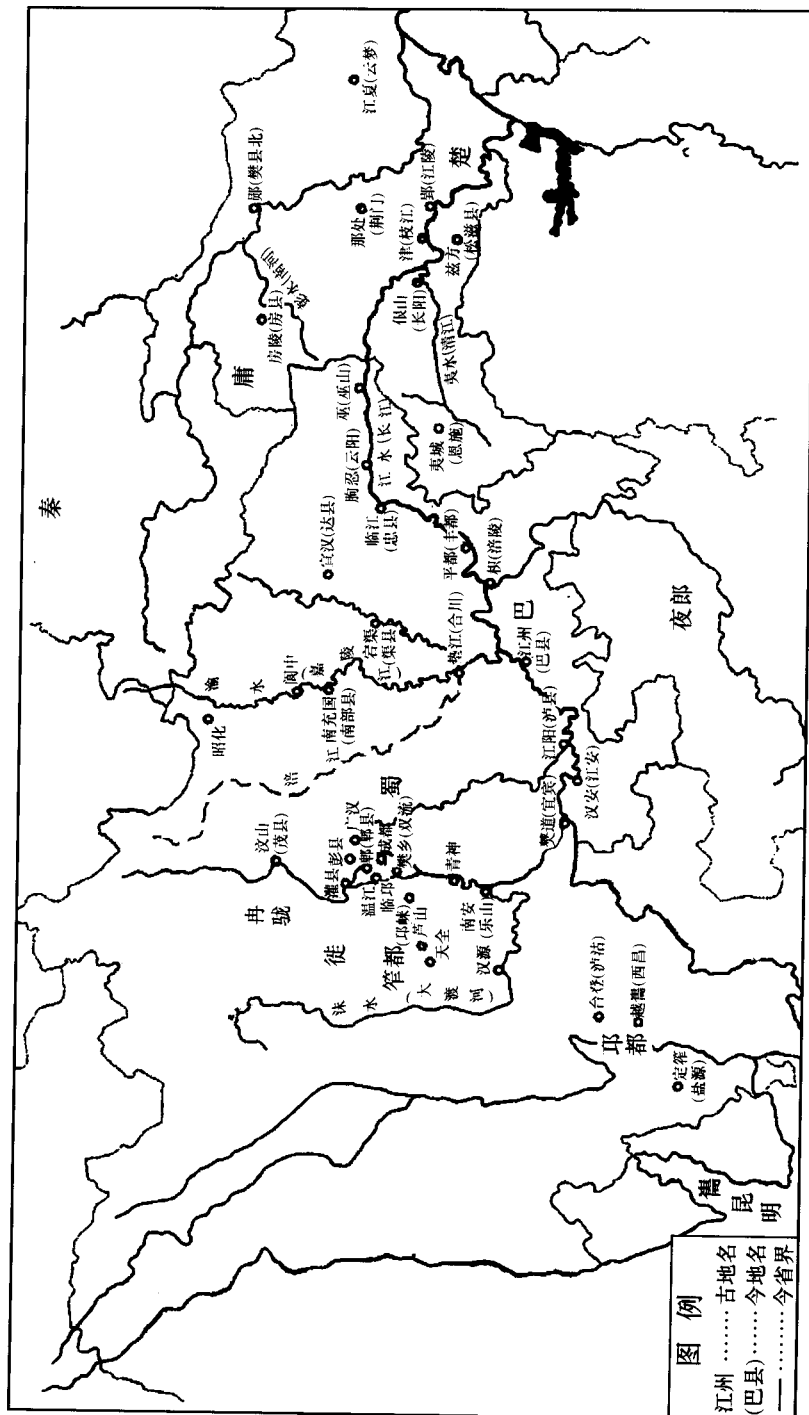


图 1.1 古代巴蜀示意图(引自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附图)

支由汉水而上，散居大巴山一带。地域包括汉中南部诸县、四川南江和通江流域，湖北省的西部直到三峡。春秋战国之际，巴人向外扩展，以今重庆为中心建立起影响波及川东、川北、鄂西、陕西南、湘西、黔东北的巴文化。同时，巴与周边楚、蜀、秦民族和国家交往频繁，深受楚文化、蜀文化的影响。公元前316年巴被秦所灭。

古蜀历史更为久远，但蜀族早期的历史记载极少。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理县、汶川县境内，发现与甘肃马家窑文化相类似的石斧、石凿、彩陶等^[7]，有学者推测蜀族的祖先很可能是黄河上游氏族的一支，从川西高原进入成都平原的边缘地带^[8]。历史也有蜀族为黄帝后世的传说。黄帝族最早居住在西北地区，《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其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处”的生活，属于氏羌系统。以后有一支南下而定居岷江流域。黄帝之子昌，娶蜀山氏女，生帝高阳（颛顼）。《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史记》均有相似记载：

“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关于蜀族早期历史记载见《全汉文》卷53：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蜀之先王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年，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

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开创了古蜀最初的历史。据考证，“蚕丛活动区域，主要是成都平原西北的山区，即岷江上游一带”，“鱼凫时代，蜀族逐渐向东南方向的成都平原发展”^[9]。一般认为，蚕丛、柏灌、鱼凫只是一些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长，代之而起的是望帝杜宇，此时蜀国的国力和疆域范围才开始大规模地拓展，从而开创出一个颇具规模的蜀王国。杜宇时代的疆域已经北达汉中，南抵今青神县，西至今芦山、天全一带，向东则直抵嘉陵江，并且和当时中原的周王室有了许多来往。杜宇族灭亡年代一般推测在春秋早期或中期，其统治上限因年代久远，缺乏可信记载。在其施政百年之后，政局发生动荡。史料载其禅位于来源于荆楚之地的鳖灵，鳖灵取代杜宇成为新的蜀王，号开明（从帝），定都樊乡（今四川双流县）。到了开明五世，国都才迁往成都。开明时代，开辟出了比杜宇时代更为辽阔的疆域。《华阳国志·蜀志》说此时：

“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今雅安芦山一带）”。

开明氏统治蜀的时间为春秋早中期至公元前316年。开明王朝已是政治体制相对完善，农业、手工业、商业相对发展的奴隶社会，开明王朝承袭了12代，最后才被秦国所灭。

春秋末战国初期开始，巴、蜀由于地域、习俗的相近及相互融合使得文化之间相当程度一致，创建了独具地方与民族特色的巴蜀文化。秦举巴蜀后，巴蜀文化与华夏文化相融合，巴蜀文化特征削弱。

1.2 巴蜀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

有关古代巴蜀的古籍记载，多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而成，因此通过考古资料研究古代巴蜀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对三星堆遗址小规模考古发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成都平原与峡江流域相继发掘了一批重要的遗址、墓葬。出土的大量遗物，丰富了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如巴蜀文化的年代、内涵、范围、族属、冶金技术、社会经济状况等，为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深化了人们对巴蜀文化的认识。

其中重要的考古发现有：

1954年，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相继发现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船棺葬，船棺葬的排列整齐而密集。墓葬出土了大量青铜器、陶器和印章，其年代在秦灭巴蜀前后到汉初^[10,11]。

1953~1956年，成都北郊清理的成都羊子山土台，残高10m，台底103m，最上层31m。原报告认为土台年代是西周至战国，后学者林向提出年代可能为商代。土台性质为大型礼仪中心^[12]。

1957~1958年，四川新繁县（今新都）水观音遗址的居址堆积中发掘出土铜镞和铜饰件，并在该地墓葬中出土了戈、矛、钺等铜兵器，推断居址铜器为商周之际，墓葬铜器年代为西周、春秋遗物^[13]。

1959年，四川彭县竹瓦街铜器窖藏出土容器8件，兵器13件，其中有2件器物被认为是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得的。1980年，在1959年铜器窖藏附近又发现一窖藏，内有铜鬲4件，戈、戟、钺等兵器15件。这两个窖藏的年代推断均为西周春秋之际^[14-16]。

1965年，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不少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壶上有习射、采桑、水战等图案，十分精美，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末^[17]。

1972年，涪陵小田溪发掘3座战国土坑墓，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墓主人为巴上层统治者^[18]。从20世纪70年代陆续对小田溪进行墓葬发掘与清理。经过了4次发掘，清理墓葬9座。小田溪墓葬群遗址面积80000m²，出土文物360余件，特别是14枚编钟是迄今巴文化考古史上罕见又最为完整的编钟乐器。小田溪遗址墓葬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19,20]。

1980年发掘的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多5件或2件成组，时代为战国早、中期^[21]。

1980以来的三星堆遗址发掘，特别是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器物坑的相继发现，使四川盆地考古受到国内外极大的关注，形成该地区青铜时代考古的一个高潮。三星堆

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总面积 12km²，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先秦遗址^[22]。一、二号器物坑共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陶器等 1000 余件，其中青铜器 700 余件。其铜器既有商代中原系的青铜容器，如青铜礼器以青铜尊最具代表性，铜尊为折肩，尊口微内勾卷，圈足高且足壁外弧；又有极具地方特色的青铜人像、神树。此外，还有一些虎、蛇、鸟等神话动物像、嵌绿松石铜牌饰等^[23]；另有大量玉石圭、璧、环、琮等礼器。其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末周初。三星堆青铜文化已被公认为早期蜀文化的代表。

1985 ~ 1987 年，在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的木构干栏式建筑，出土大量商周时期遗物，其遗址年代涵盖了从商晚至西汉以后。其文化内涵与三星堆遗址具有明显的共性和发展连续性，该遗址为认识四川盆地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材料^[24]。

1995 年，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宝墩村等 8 座早于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城址^[25]。它们年代略有差异，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遗存，被命名为“宝墩文化”。

2000 年，成都商业街发掘出土大型船棺和独木棺 17 具，整齐排列在长 30m、宽 20m 的竖穴式墓坑中。最大一具船棺的主人应是“开明”末世的某代君主。时代约为春秋后期^[26]。

2001 年，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推进，在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发掘了金沙遗址^[27]，出土文物包括玉器 900 余件、金器 40 余件、青铜器 700 余件，还有石器、象牙、大量用于占卜的龟甲及动物骨骼、牙齿，绝大多数器物属于祭祀类礼器，其年代推断为商晚到西周早期。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青铜器、金器与三星堆有同有异。玉器种类尤为丰富。金沙遗址的发现为探索三星堆文化的去踪提供了重要线索。

成都平原近年来不断有新的重要遗存发现和公布，如成都市指挥街遗址^[28]、雅安县的沙溪遗址^[29]、宣汉罗家坝遗址^[30]等。

伴随三峡工程建设，峡江流域的考古发掘工作有了空前的发展。近年来在峡江流域发掘了不少遗址墓葬，出土为数不少的巴蜀青铜器。为全面认识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带来极大帮助。多数发掘特别是一些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尚处于整理阶段，发掘材料公布的极为有限，给现阶段的研究带来一些不便。

1.3 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

“巴蜀文化”是 20 世纪 40 年代由卫聚贤提出的^[31]，是指当时收集到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铜罍、铜壶等容器和铜戈、铜剑、铜钺等兵器。以后随着墓葬的发掘，才从考古学角度确认了“巴蜀文化”。故在分期、地域范围等众多内容方面，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巴蜀文化是一致的。

1.3.1 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分期、范围、特点

关于巴蜀文化的分期，有学者认为巴和蜀是两种不同的文化^[32]，以战国为界将巴、蜀文化分为早期巴、蜀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另有学者将巴、蜀作为一整体进行研究。如张天恩将巴蜀文化归纳为三大期：早期，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尚无铜器发现；中期，商代至西周，已发现大量精美青铜器；晚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巴蜀文字系统^[33]。赵殿增将巴蜀文化分为三期：早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中期；中期从商代中期到春秋战国之际；晚期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孙华将战国时巴蜀的文化分为战国早中期和战国后期至西汉早期两期^[34]。

上述分期有一共同点，即晚期巴蜀文化的上限都在春秋末到战国初。主要是战国之后的巴文化与蜀文化在丧葬制度，如棺槨情况、随葬器物组合及随葬兵器形制、纹饰等方面已经融合，巴蜀文化已成为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同一种文化。有学者根据墓葬器物形制演变及器物组合关系，将晚期巴蜀文化做了更细致分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早段、战国晚期晚段至西汉初期^[35]。

1) 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分期

参照学者们对巴蜀文化的分期，结合巴蜀地区出土青铜器的墓葬年代，本书将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大致分为三期^①。

早期：商末周初，以三星堆两祭祀坑为代表的早期蜀青铜文化。

中期：周初至春秋，以新都水观音、彭县竹瓦街遗址等为代表的蜀青铜文化。

晚期：战国至西汉初期，巴蜀融为一体。绝大多数巴蜀墓葬均为此期。本书所研究的青铜器均是此时期的。

2) 巴蜀青铜文化地域范围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青铜器遗址的分布，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平原及峡江地区出土巴蜀青铜器的地点已达近百个县市，除川西北高原山地之外，在邻近省区，鄂西、湘西、陕南、甘南及贵州和云南靠近四川的地区亦有发现。多数学者将以陕西城固遗址等为代表的具有相同文化面貌的遗存也归入巴蜀文化范围。本书主要集中在峡江地区及成都平原。

3) 各期青铜器的特点

早期（商末周初）蜀青铜器特点：主要指三星堆文化铜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礼器有尊、罍、戈、瑗、钟、铃等种类。容器少，不成套，没有鼎、爵、鬲等中原礼器。罍、尊是早期蜀青铜文化中最重要铜礼器，形体厚重、花纹繁缛，受到中原风格影响，但在纹饰的排列组合以及形制方面与中原有一定差异。祭祀坑出土的“重器”是立人像和头像、面具、神树等。有不少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有观点认为其是从中原青铜文明中心引进了铸造技术，但由于当地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落后性，这些“重

① 由于巴文化早、中期发掘出土的青铜器材料较少，故早、中期以蜀青铜文化考古材料为代表。